

重定中国生育政策 厘清人口发展战略

2011年4月公布的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表明,过往20年来,中国人口统计和预测存在显著偏差,生育水平被严重高估,而人口结构的少子化和老龄化趋势则被显著低估。这种偏向严重误导了对人口形势的正确把握,也贻误了及时应对的决策。

当前,中国迫切需要解决两大问题:一是澄清以往多年的生育率及当前生育水平到底有多高;二是在此基础上,重估未来人口发展前景,并制定恰当的对策。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以往类似研究虽然很多,但由于对人口发展的真实状况缺乏正确的体认,难以做出更具前瞻性的预测与决策研究。

人口形势存在严重误判

以往十多年,中国总和生育率一直低于1.5,不少年份甚至连1.4都不到。但是,有关政府部门却坚持1.8的总和生育率口径,并据此制定人口发展战略和规划。

2011年公布的最新人口普查数据显示,中国公众和决策者对人口形势存在严重误判。

20年前,中国的总和生育率就下降到更替水平以下,此后继续走低。近15年来,生育率一直低于1.5。也就是说,一对夫妇终其一生只生育1.5个孩子。

据2011年世界人口数据表,当前中国的生育率位居世界低水平前列:既低于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1.7),也低于生育率最低的欧洲(1.6)。在全球十个人口大国中,中国的生育率仅仅略高于日本(1.4)。如此低的生育率表明,未来中国每代人人口将比上一代缩减25%。

虽然早在20年前中国就已跨入了低生育率时期,然而,整个社会对如此重大变化却认识不足,决策者的认知仍滞留在高生育率时期。于是,当历次全国人口调查不断揭示出极低生育水平时,人们却不敢相信,难以接受,总是用严重的出生漏报加以解释。

然而,证明出生漏报的人口估计却大多并无确凿证据,有些甚至存在着明显的方法和逻辑错误。比如,2006年全国人口和计划生育抽样调查结果发布后,曾掀起“生育反弹、形势严峻”的风潮,但是,此后的实证研究发现,此次调查发现的“较高生育率”其实是因为该调查样本严重偏差所致。

■财富故事I

兄弟情难敌千亿资产

郭炳湘本人目前不在香港。4月16日,他通过发言人表示,自己的一切行动都是为了维护自身和家人的权益。

“我们暂时没有回应。”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新地发言人表示。

郭氏家族的消息人士则对本报记者强调,目前在全球任何地方,郭炳江和郭炳联两兄弟与大哥郭炳湘之间没有任何正在进行中的上诉,包括列支敦士登。

郭氏兄弟此前已多次交手。今年3月,郭炳江及郭炳联因涉嫌触犯防止贿赂条例,被香港廉政公署(下称“廉署”)拘留(随后保释),市场一度传言,两人被廉署刑拘正与郭炳湘有关。

起诉悬疑

郭炳湘与两个弟弟的说法大相径庭。

接近郭炳湘的人士向港媒透露,在瑞士进行仲裁的结果是,郭炳湘为郭氏家族基金的受益人,因此有权查阅信托相关文件。郭炳湘将瑞士仲裁的判词拿到列支敦士登的法院申请索取文件,列支敦士登的法院大



经过30多年的生育控制,中国遏制了人口快速增长的态势。当前,中国人口依然微弱增长,但是,这只不过是人口结构的惯性使然。十年后,中国人口或将进入峰值,并快速下降。持续20多年的低生育率,造成了严重的少子化、老龄化,已代替总量失控而变成中国向现代转型的主要风险。中国亟待厘清人口发展战略,重定人口和生育政策。

近20年来,历次人口调查均反映中国人的生育水平极低。“六普”结果再次确认,以往10多年,中国总和生育率一直低于1.5,不少年份甚至连1.4都不到。但是,有关政府部门却坚持1.8的总和生育率口径,并据此制定中国的人口发展战略和规划。

这导致对中国人口形势的判断存在着严重偏差,生育水平被显著高估,而人口结构的少子化和老龄化趋势则被明显低估。“六普”结果表明,中国人口的增长远低于以往官方预估的水平,而少子化和老龄化的发展则显著超出了以往预估。

“六普”数据展示了中国最新的人口年龄结构,镌刻着以往人口发展过程的诸多信息。从“六普”结果看,自1997年起,中国年出生数已降至1600万以下,个别年份甚至只有

1400万左右。这意味着,以往国家统计局公报的人口出生数明显偏高。

举例而言,1994年-2005年,国家统计局公报的合计出生数为2.21亿,但根据“六普”结果推算出的结果仅有1.90亿。也就是说,这12年间,官方统计公报累计高报出生3100万,平均每年高报259万,平均高报率为16.3%。

2006年后,国家统计局公报的人口数据才有明显改善。

但是,高估生育率和出生数等问题在各种规划和预测中依然极为普遍地存在着。尽管这些预测和规划一再被调查数据证明有误,却从未得到澄清。这种高估生育率的偏向,至今仍然主宰着对当前人口形势的判断。

比如,“十五”人口规划时,主管部门预测的2005年总人口为13.31亿,但200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取得的总人口结果却只有13.08亿,规划预测数比实际总人口数高出2300万。同样,按“十一五”人口规划,

2010年总人口13.60亿,然而“六普”结果显示,2010年底中国只有13.40亿人,规划多出了2000万人。

上述两个五年人口规划预计,中国人口年均递增1000万。但是,这种情况根本没有出现,实际上,中国每年平均仅增加600万人而已。受官方统计口径的影响,前些年绝大多数人口研究依然倾向于高估生育率。危险的是,这种偏向持续了近20年,至今仍未得到纠正。

维持当前极低生育率的时间过长,将会使中国每100名劳动人口需要负担114个老人和小孩。

迟20年放开生育行吗?



给出截然相反的信息。

4月17日,接近郭氏家族的消息人士向本报记者确认,瑞士的官司是由郭炳湘提出的。2010年1月,郭炳湘在瑞士仲裁法院起诉郭炳江、郭炳联及家族基金的法定代表,提出7项要求,包括有权查阅家族信托基金的相关文件。2011年10月27日,瑞士仲裁法院已经否决所有7项要求。该人士拒绝透露其他6项要求的内容。

2010年10月底,新地公布郭氏家族信托基金重组,分成三份,分别归属郭炳江及其家人、郭炳联及其家人以及郭炳湘的家人。

翻看新地最新的财务资料也可以看出,郭炳湘已经被踢出信托基金。“郭炳湘先生于该1081739328股新鸿基地产股份中并无拥有任何权益。”新地财报中指出,总计约10.8亿股新地股份即郭家通过家族信托基金持有。至去年底,郭氏家族基金增持新地至约10.9亿股。

郭炳湘则强调,“本人得到若干有关本人于本公司的股份权益的资料,与本人所理解的存在严重分歧。本人于本公司的股份权益现正在争议中。”

据悉,郭氏家族信托基金的有关文件现存放在列支敦士登。

在信托服务方面,列支敦士登具有很高的保密性,信托内容无须向任何列支敦士登机构或国外的政府机构备案或公开资料。只有在法院对犯罪行为做出判决的情况下,客户资料才有可能被披露。

“仲裁地的选择取决于合同约定或者当事双方的约定,仲裁内容则是保密的。”一位在仲裁机构工作的人士告诉本报记者,瑞士仲裁的美好声誉使之成为商业机构的首选仲裁地点,而纽约公约则保证了瑞士的仲裁

裁决在世界上140多个缔约国得到承认与执行。

纽约公约全称《承认及执行外国仲裁裁决公约》,纽约公约要求缔约国法院在诉讼争议有仲裁协议的情况下赋予该协议通过仲裁解决的效力,并承认和执行在其他缔约国做出的仲裁裁决。去年7月,列支敦士登也加入了纽约公约,该公约自2011年10月5日起对列支敦士登生效。

“瑞士也是纽约公约的缔约国,在瑞士获得的仲裁结果能在列支敦士登得到当地法院的认可,从而得到法院的强制执行。”一位不愿具名的法律界人士向本报记者解释。

(摘自《21世纪经济报道》)

展的劳动力将由两部分出生人口组成:一部分是1990年-2010年的出生人口,这些人口的数量已成定局。但是,这一群体的绝对数量被严重高估了。另一部分则是未来的出生人口,其数量是可变的,到底多少,要取决于未来生育政策如何调整。

人口战略要有百年眼光

也就是说,2010年以后出生的人,正是中国进入重度老龄化后的主要劳动力。中国人口老龄化的总趋势不可逆转,然而延缓并控制老龄化,仍然是可有作为的。如果对当前过低生育率无动于衷,追求人口越少越好,必将危及中国的可持续发展。

当前中国人口的主要症结是生育率过低,根本出路是有效提高过低生育率。

以往政府主管部门多专注于严控生育率,对提升生育率,无论是理论还是实践上,几乎都是空白。其他国家其实也并没有成功的经验。如果不能有效提高生育率,到21世纪末,中国总人口可能仅为8.5亿,但是,为此付出的代价将是剧烈的老龄化。

基于“六普”结果的多方案人口测算表明,中国尽快把生育率提至接近更替水平,是更优的选择。即使这样,中国总人口峰值也不会超过15亿。但这样做的好处是,未来老龄化程度将得到相当程度的缓解。

其实,总和生育率越接近更替水平,未来社会总抚养比的峰值(老年人口与少儿人口加总后占劳动年龄人口的比例)就会越低。因此,中国决策者面临着严峻的选择,到底是要刻意追求人口尽快缩减还是要尽量避免该结果发生。

如果推迟30年再提高生育率到更替水平,该方案虽可取得更低的总人口峰值,但是,维持当前极低生育率的时间过长,将会使中国在老龄化最严重的时期恰逢极为严重的社会总负担。到时候,每100名劳动人口需要负担114个老人和小孩!这是基于人口统计学的预测,并非危言耸听。

(摘自《中国改革》作者郭志刚为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仲裁地玄机

据悉,郭氏家族信托基金的有关文件现存放在列支敦士登。

在信托服务方面,列支敦士登具有很高的保密性,信托内容无须向任何列支敦士登机构或国外的政府机构备案或公开资料。只有在法院对犯罪行为做出判决的情况下,客户资料才有可能被披露。

“仲裁地的选择取决于合同约定或者当事双方的约定,仲裁内容则是保密的。”一位在仲裁机构工作的人士告诉本报记者,瑞士仲裁的美好声誉使之成为商业机构的首选仲裁地点,而纽约公约则保证了瑞士的仲裁



▲新鸿基豪门内斗

裁决在世界上140多个缔约国得到承认与执行。

纽约公约全称《承认及执行外国仲裁裁决公约》,纽约公约要求缔约国法院在诉讼争议有仲裁协议的情况下赋予该协议通过仲裁解决的效力,并承认和执行在其他缔约国做出的仲裁裁决。去年7月,列支敦士登也加入了纽约公约,该公约自2011年10月5日起对列支敦士登生效。

“瑞士也是纽约公约的缔约国,在瑞士获得的仲裁结果能在列支敦士登得到当地法院的认可,从而得到法院的强制执行。”一位不愿具名的法律界人士向本报记者解释。

(摘自《21世纪经济报道》)

建议维持低出生率的着眼点是在短期内控制人口规模,却忽视了生育率过低将导致人口结构过度少子化和老龄化的风险。更值得注意的是,这种政策建议的视野仅限于本世纪中叶,前瞻性严重不足。

人口战略要有百年眼光

建议维持低出生率的着眼点是在短期内控制人口规模,却忽视了生育率过低将导致人口结构过度少子化和老龄化的风险。更值得注意的是,这种政策建议的视野仅限于本世纪中叶,前瞻性严重不足。

也就是说,2010年以后出生的人,正是中国进入重度老龄化后的主要劳动力。中国人口老龄化的总趋势不可逆转,然而延缓并控制老龄化,仍然是可有作为的。如果对当前过低生育率无动于衷,追求人口越少越好,必将危及中国的可持续发展。

当前中国人口的主要症结是生育率过低,根本出路是有效提高过低生育率。

以往政府主管部门多专注于严控生育率,对提升生育率,无论是理论还是实践上,几乎都是空白。其他国家其实也并没有成功的经验。如果不能有效提高生育率,到21世纪末,中国总人口可能仅为8.5亿,但是,为此付出的代价将是剧烈的老龄化。

基于“六普”结果的多方案人口测算表明,中国尽快把生育率提至接近更替水平,是更优的选择。即使这样,中国总人口峰值也不会超过15亿。但这样做的好处是,未来老龄化程度将得到相当程度的缓解。

其实,总和生育率越接近更替水平,未来社会总抚养比的峰值(老年人口与少儿人口加总后占劳动年龄人口的比例)就会越低。因此,中国决策者面临着严峻的选择,到底是要刻意追求人口尽快缩减还是要尽量避免该结果发生。

如果推迟30年再提高生育率到更替水平,该方案虽可取得更低的总人口峰值,但是,维持当前极低生育率的时间过长,将会使中国在老龄化最严重的时期恰逢极为严重的社会总负担。到时候,每100名劳动人口需要负担114个老人和小孩!这是基于人口统计学的预测,并非危言耸听。

(摘自《中国改革》作者郭志刚为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仲裁地玄机

据悉,郭氏家族信托基金的有关文件现存放在列支敦士登。

在信托服务方面,列支敦士登具有很高的保密性,信托内容无须向任何列支敦士登机构或国外的政府机构备案或公开资料。只有在法院对犯罪行为做出判决的情况下,客户资料才有可能被披露。

“仲裁地的选择取决于合同约定或者当事双方的约定,仲裁内容则是保密的。”一位在仲裁机构工作的人士告诉本报记者,瑞士仲裁的美好声誉使之成为商业机构的首选仲裁地点,而纽约公约则保证了瑞士的仲裁

裁决在世界上140多个缔约国得到承认与执行。

纽约公约全称《承认及执行外国仲裁裁决公约》,纽约公约要求缔约国法院在诉讼争议有仲裁协议的情况下赋予该协议通过仲裁解决的效力,并承认和执行在其他缔约国做出的仲裁裁决。去年7月,列支敦士登也加入了纽约公约,该公约自2011年10月5日起对列支敦士登生效。

“瑞士也是纽约公约的缔约国,在瑞士获得的仲裁结果能在列支敦士登得到当地法院的认可,从而得到法院的强制执行。”一位不愿具名的法律界人士向本报记者解释。

(摘自《21世纪经济报道》)

裁决在世界上140多个缔约国得到承认与执行。

纽约公约全称《承认及执行外国仲裁裁决公约》,纽约公约要求缔约国法院在诉讼争议有仲裁协议的情况下赋予该协议通过仲裁解决的效力,并承认和执行在其他缔约国做出的仲裁裁决。去年7月,列支敦士登也加入了纽约公约,该公约自2011年10月5日起对列支敦士登生效。

“瑞士也是纽约公约的缔约国,在瑞士获得的仲裁结果能在列支敦士登得到当地法院的认可,从而得到法院的强制执行。”一位不愿具名的法律界人士向本报记者解释。

(摘自《21世纪经济报道》)

裁决在世界上140多个缔约国得到承认与执行。

纽约公约全称《承认及执行外国仲裁裁决公约》,纽约公约要求缔约国法院在诉讼争议有仲裁协议的情况下赋予该协议通过仲裁解决的效力,并承认和执行在其他缔约国做出的仲裁裁决。去年7月,列支敦士登也加入了纽约公约,该公约自2011年10月5日起对列支敦士登生效。

“瑞士也是纽约公约的缔约国,在瑞士获得的仲裁结果能在列支敦士登得到当地法院的认可,从而得到法院的强制执行。”一位不愿具名的法律界人士向本报记者解释。

(摘自《21世纪经济报道》)



李小琳：攀比和欲望都是不幸福的因素

博鳌亚洲论坛2012年年会于4月1日至4月3日召开,4月1日,中国电力国际有限公司董事长李小琳在“博鳌青年领袖圆桌会议:定义幸福和幸福社会”上表示,幸福是一个发现的过程,在这个世界上存在着很多、很美的东西,但不见得每个人都有发现美的眼睛。而谈及什么会产生不幸福,她就认为,攀比、欲望都是不幸福的因素。

以下为嘉宾发言实录:

李小琳:大家都谈到幸福,大家说幸福是一种感觉,这种感觉是动态的、流动的,其实也是无偿的。幸福是我们主观的感受,主观感受是我觉得幸福,而不是别人觉得你是不是幸福。另外,幸福是一个发现的过程,在这个世界上存在着很多、很美的东西,但不见得每个人都有发现美的眼睛。幸福还是一个过程,人生体验的过程。也许你目前正在经历着一个比较艰辛、困难的时候,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你有一个目标。还有,幸福也是一个高尚的实践,小的时候我们常常说,幸福很简单,幸福就是一种得到。得到了衣服、得到了糖,小时候得到了玩具,幸福就达到了。长大了以后幸福就是目标,你能够完成这个目标了,幸福就是实现目标。其实成熟了以后,幸福又变了,成熟了以后幸福就不再以物喜,也不以己悲,就是领悟到这种心态。

刚才大家谈到哪些有幸福感,哪些让你有幸福的感受。大家都有各种各样的感受,我想反过来说什么是不幸福?不幸福的感受是什么?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应该有两个感受,一个是物质的感受,还有一个是精神的感受。物质上我们应该有一个基本的物质条件,包括人们的衣食住行、社会秩序、医疗保障、教育都是基本的物质。二是精神层面的,你有没有信仰?有没有精神的世界?有没有崇高的理想?刚才我听到前面第一位美女提到的,所有这些感觉我觉得能够对大众,对人类有一些贡献,这是幸福的感觉,是高尚的品质。

什么会产生不幸福呢?我下面还有一个新闻发布会,可能没办法听太多,我想给成钢一个提示,我听到有一个“攀比”,很多东西都是从攀比心来的,因为一攀比以后,老王今天发奖金了,他发1万块钱,好高兴。旁边的人发了两千,我比他幸福。但他听到别人有一个人发2万,我怎么这么不幸福。攀比出来的,跟自己相比已经很幸福了,所以攀比之后不是在物质基本层面,而要更高的,所以产生了烦恼。还有姚明谈到的欲望,人们的欲望有满足和不满,欲望满足了就幸福了,无止境的欲望是不可能被满足的。所以欲望也带来很多、很多的烦恼,攀比、欲望我认为都是不幸福的因素。当然了,我还说到最基本的条件也应该满足,在我们的社会当中我们应该倡导一种什么样的生活?可能一会儿你们会继续谈到。比如说罗杰说到我们是很好的家族,不断地贡献,他也有非常高尚的品格,我们也非常敬重他自己的努力。但社会上应该提倡量入为出,提倡勤俭节约、健康的生活方式。(摘自《腾讯财经》)